

<<叫魂>>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叫魂>>

13位ISBN编号：9787542611871

10位ISBN编号：7542611879

出版时间：1999-1

出版时间：上海三联书店

作者：[美] 孔飞力

页数：334

字数：210000

译者：陈兼,刘昶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叫魂>>

内容概要

本书所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盛世妖术”的故事。

在中国的千年帝制时代，乾隆皇帝可谓是空前绝后的一人。

他建立并巩固起来的大清帝国达到了权力与威望的顶端。

然而整个大清的政洽与社会生活却被一股名为“叫魂”的妖术之天错地暗。

在1768年由春天到秋天的那几个月里，这股妖风竟然冲击了半个中国，百姓为之惶恐，官员为之奔命，连乾隆也为之寝食难安。

作者细致入微的描写令人颤栗，他生动地再现了各省的恐慌是如何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除妖运动。

本书也表现出了一种更为宏大的学术视野，在构建以“叫魂”案为中心的“大叙事”的过程中，在方法论的层次上将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区域分析、官僚科层制度分析以及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

本书可作为学生必读参考书。

<<叫魂>>

作者简介

孔飞力，是美国及西方中国史研究中人们公认的一位大家，现任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和东亚语言文化系讲座教授。

他于1964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当费正清教授1977年从哈佛大学荣退后，孔飞力由已任教十多年的芝加哥大学转回母校接替费正清留下的空缺，一直任教至今。

他曾担任过

<<叫魂>>

书籍目录

中译本序言第一章 中国窃贼传奇 德清县的石匠们 萧山事件 苏州的乞丐们 胥口镇奇事 官僚机制对妖术的处理第二章 盛世 弘历治下的镀金时代 民众意识中的盛世第三章 或现或隐的威胁 关于谋反罪的看法 由汉化带来的腐化第四章 罪的界定 源于南方的罪恶 发生在山东的案例 《大清律例》中有关妖术的条款第五章 妖术大恐慌的由来 躯体与灵魂 妖术预防法 对于们道的怀疑第六章 各省的清剿 弘历的行省官僚 江南的隐情 接踵而来的危机第七章 妖党的踪迹 妖术西行 运河上的妖术 对嫌犯的围捕 两心相悦的奸情 一个冥顽有化的嫌犯第八章 终结 民间的诬告 被告席上的叫魂犯 说服弘历 与官僚机器算总账 终结第九章 政治罪与官僚君主制 官僚君主制中的常规权力和专制权力 君主对官僚的控制 常规控制的制度障碍 特殊的考评制度 叫魂危机中帝王控制的运作 官僚的抵制 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官僚君主制第十章 主题和变奏 君主：真实和幻影 知识阶层和大众对妖术的看法 普通民众：权力的幻觉 官僚制度：谨慎的喝采参考文献书目致谢译者后记

<<叫魂>>

章节摘录

这一长期遭受灾害的地区是否与别处有特别的不同？

虽然这可能是一个特别糟糕的个案，但广德的生态环境却并非独一无二。

层层叠叠的小山脉在北边构成了一道长达五百余里的屏障，处于丘陵地区的各县东北起自太湖附近，西南抵达江西省界。

颇有意思的是，社会史家们通过来自位于这一地区西南角的徽州商人在全国范围内取得的成功，来说明清代的商业生活是何等生气勃勃。

然而，徽州本地的经济，却与我们刚刚作过描绘的广德的情况非常相近：这里地处丘陵，土地贫瘠，因沿海地区过于拥挤而离乡背井的无地农民来这里安身立命，这是一个相对来说尚未商业化的农业地区。

在徽州，存在于那些长期定居此地、以务农为生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一种近于农奴制的体系之上的，这同平原地区自由发展的农庄经济形成了生动的对照。

从整体上来说，由于受到将一直持续到下个世纪的移民浪潮的影响，这一地区的人口数目大大膨胀。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名士汪士铎曾作为难民生活于这一地区(徽州府绩溪县)，他对当地的情况作过这样的描述：长期贫困，人口过多，基本商品缺乏。

尽管女婴被溺杀的比例甚高，由于人们成婚的年龄极早(甚至达到了男子“三十即可为祖”的程度)，人口增长仍在继续。

他所记述的这个县份，出口茶叶、木材制品，偶尔还出口贵金属和铅。

但这里的基本状况却是糟糕之极：“环县皆山，力农者层累而上，尺耕而寸刈之。

旱则忧槁，雨则忧冲。

虽终岁勤勤而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

虽然绩溪是地区性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由于核心地区的商业化发展，才使得绩溪的少数出口商品有可能得到出售——但绩溪及其周围的地区却同苏州与杭州所处的那个世界形成了惊人的对照。

当那些大都市受到困难时期的冲击时，绩溪一类的内地县份又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

在论述十八世纪的经济时，没有人能够抹煞存在于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以及富庶的三角洲与贫瘠的山区之间的巨大差异。

与经济地图上这一倾斜趋势同时而来的则是人口的持续流动：移民与过客，商人与江湖骗子，僧人与进香者，扒手与乞丐，拥塞在十八世纪的道路。

人们外出旅行，有的是为了雄心勃勃的事业，有的是基于献身精神，有的则是出于绝望与无奈。

由旅行者汇集而成的人流，不能不对人们的意识发生影响。

向外部与下层的人口流动 有关叫魂的怀疑都集中在流浪者身上，包括陌生人，没有根基的人，来历不明与目的不明的人，没有社会关系的人，以及不受控制的人。

最有可能沦为暴民私刑和官府堂上刑罚受害者 的，是和尚和乞丐。

如果我们考虑到和尚其实也是一种乞丐，那就可以说，被怀疑从事叫魂的人都是乞丐。

他们究竟从何而来？

为什么他们会使人产生恐惧？

人口增长与生态环境变化。

十八世纪期间，中国的人口大约翻了一番，从1700年的一亿五千万左右增加到了1794年的三亿一千三百万左右。

这一增长的前提，是中国发展出新的方式，或是开发出新的地区使得人们能生存下去。

在这些方式中。

包括从新世界引进的诸如玉米和甜薯一类的作物，从而使得山地也能为移居那里的人提供生计。

这还包括大规模的国内人口流动，尤其是人口向着因征服时期的内战而人数锐减的四川地区迁徙。

人口还移往处于长江与汉江流域的高地，移往满洲，移往很大程度上仍由土著居民居住的台湾，以及

<<叫魂>>

移往海外。

在中国各地，人们都在向上或向外移动。

曾经长满树木的山丘被开发成为勃勃发展的甜薯和玉米农场，直至山地因水土流失而变得不可耕种。

十八世纪期间，可耕种土地到底有多大扩展，还难以计量。

但有人认为，直到1800年这种扩展仍在全国范围内同人口增长保持着平衡。

所有这一切，可以看作是人们意志与行为的成功，但同时也是生态环境的灾难——因为，中国山地的泥土都渐渐地被冲刷到江河中去了。

我们应该把乾隆年间的商业看作是汲取不断增长的劳动力的蓄水池。

它使得只有小块土地的家庭能通过出售家中妇女与孩童的手工作品而得以生存。

但是，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无论是商业的扩展还是向外部的移民都不能使每个人都得到关照，总有一部分人会被完全排除在生产性经济之外。

他们的出路，并不在于向外迁徙，而是向社会的下层移动，沦为乞丐之类的社会下层阶级。

我们尚未掌握什么可靠的方法，能够对时值盛世而离乡背井的人数及其背景情况作出精确的判断。

对当时人口进行登记的种种措施，并没有将无家可归者包括在内。

过了一个世纪后。

在十九世纪的经济危机期间，不少观察家理所当然地看到了有很多人四处流浪。

相形之下，十八世纪看上去就像是黄金时代。

然而，尽管对流浪人数的看法不同，早在十八世纪六十年代社会便意识到流浪者存在的情况仍然使我感到惊奇。

这个问题之所以特别令人感兴趣，是因为，有着各种不同背景的流浪者——不管是僧道还是俗人——在妖术大恐慌中都成了被人怀疑的对象。

下层道士僧人。

当妖术危机达到高潮的时候，一个名叫李英的年迈道士因涉嫌剪人发辫而被直隶省当局逮捕，后来又被送往承德的夏宫，交由军机处审理。

李英招供如下：我系定州人，今年五十七岁，父母妻子已身故，一向在外佣工度日。

于(乾隆)三十一年在房山县做工后，因贫乏难过，发愿出家，在黄莲洞跟道士傅月砍柴挑水。

傅月因庙中穷苦，不肯留住。

有石堂寺僧人广善，亦系定州人，修理庙宇，我遂往投他做工。

后来，李英又从别人处听说了“立志修行，从不下山”的大道士王来水的名字。

王来水的一个徒弟带他去见师傅，可是王来水“因粮米短少，亦不肯留住”他。

十天后，在下山的路上，李英跌伤了腿。

“遇民人韩俊发扶我至村中，养活数月。

今年二月腿好了，才出来募化度日。

七月初七日，至小井地方，遇总督大人经过，我去观看，即被拿获。

处于社会边缘的下层和尚道士的人数到底有多少？

四川省一位按察使曾指出，有越来越多的失业男女，未经削发，便以“带发修行”为名，“潜居庵观”。

他们既非僧道又非俗人，在寺庙庵观中过着地下生活，“勾引为匪，花消寺产”。

我们可以将这种现象视为民众的一种虚伪的宗教虔诚，也可以把这些人看作难以为当时经济所吸纳的多余部分。

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在关注安全问题的官员们看来，这些人都是—种威胁。

当然，当时并没有什么可靠的手段来统计他们的人数。

最令人感到吃惊的是，尽管皇帝本人对于和尚道士深持怀疑，到十八世纪六十年代，清政府那套用来对他们进行登记的体制已经残破不堪。

在一位经验丰富的省级官员高晋(曾任两江钦差总督)看来，政府中没有什么人在费心收集有关和尚道士的准确情报。

高晋曾亲自检查过属下一些县的登记名册，发现误差甚大，不仅对僧道总人数未作统计，就连发放度

<<叫魂>>

牒的体制也已经停止运作。

根据高晋的报告，因为无人认真执行有关僧人每收一个新徒弟(亦即每剃度一个人)都必须上报当局的规定。

只有“十之二三”的僧人道士持有度牒。

其结果令人吃惊，大批人冒充僧人道士，以至于“奸良莫辨”。

这些人不仅“罔遵戒律，蔑弃清规”，而且“甚有异言邪术，煽惑愚民，干犯法纪，大为风俗人心之害”。

<<叫魂>>

媒体关注与评论

1984年，当我来到北京开始在第一历史档案馆从事研究工作时，全然不知道最终会写出《叫魂》这样一本书。

我本来打算研究的，是清政府内部的通讯体系是如何影响其政策的实际运作的。

有名的“剪辫案”似乎为此提供了一个理想的个案研究机会：事实上，在一段并不太长的时间里，有关叫魂案的所有文献都可以得到并被作为一个有着相互关联的体系来进行研究。

尽管我仍然在有关清代通讯体系的问题上得出了一些初步的研究结论，但我很快就发现，叫魂案所揭示的一些历史问题值得更为深入地探讨。

这些问题包括：专制权力如何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不是受到法律的限制；官僚机制如何试图通过操纵通讯体系来控制最高统治者；最高统治者如何试图摆脱这种控制。

这些问题在所有社会中（包括我自己所生活的社会中）均普遍存在。

但是，作为一个研究中国的学者，当我读到乾隆时期的这些文献时，仍然受到了特别的感染。

这是因为，这些文献也揭示了近现代中国历史中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

每个社会都以自己的方式对政治权力的限度作出界定。

没有哪个社会愿意长期容忍不受限制的专权。

在清代，普通民众对于政治体制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他们在官方的滥用权力面前，也几乎得不到任何保护。

然而，历史也表明，皇帝与官僚专制在实施威权时还是受到了某种限制的。

在这些限制因素发展成长的过程中，中国文化与历史的经验对之是产生了巨大影响的。

对于陈兼博士和刘昶博士将本书译为中文，我谨在此表示感谢。

我也希望中国读者能与我分享他们对于本书的批评，以及他们对于本书所提出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的看法。

孔飞力（Philip A. Kuhn） 1998年夏于美国麻州剑桥

<<叫魂>>

编辑推荐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于1990年获美国“李文森中国研究最佳作奖”。

一位在西方世界首屈一指的中国历史专家所写的关于东方古老国家的伟大著作。

——（美）魏菲德 摘自《纽约书评》杂志 孔飞力的细节性描述是那样地引人入胜而又令人颤栗，生动地展现了各省的恐慌怎样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除妖运动。

——摘自《纽约人》杂志 本书对于专制统治的原动力作了细致、强有力却依然十分准确而又得体的探讨。

——摘自“李文森中国研究最佳作奖”评语

<<叫魂>>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